

政治传播简明原理

荆学民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创新团队（政治传播）研究成果

政治传播简明原理

荆学民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传播简明原理/荆学民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657-0933-3

I. ①政… II. ①荆… III. ①政治传播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6251 号

政治传播简明原理

著 者 荆学民

责任编辑 吴 磊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封面设计 郭 琳

出版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657-0933-3/D·0933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荆学民，男，1959年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首席专家。

近年来先后主持并完成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专项、北京市社科研究规划项目、中广协社科研究项目。先后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多部；2008年转型致力于政治传播的研究，主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丛书”、《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巡检》，出版专著《政治传播活动论》。

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哲学研究》、《光明日报》、《文艺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传播》、《江海学刊》、《天津社会科学》等权威刊物共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

前 言

2011年我牵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获得成功。这个重大项目以“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丛书”为结题成果形态,其中,对整个项目和丛书具有一定指导性意义的开篇之作是由我撰写的《政治传播活动论》。这部著作是我研究政治传播以来学术思考的结晶。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书中带有十分强烈和尖锐的批评,不够温和和谦虚。这是我有意为之的,目的是想“矫枉过正”——激活国内对政治传播研究的热情!

书稿交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我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觉得现在对于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而言,更多地还是需要建设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作为全国第一个研究政治传播的机构,不仅负有引领中国政治传播学术研究的使命,还担负着政治传播硕士和博士教育教学的任务。就教学和学生需求的角度而言,更需要一本简明的政治传播原理性的读本。每年学生考前以及入学后的教学中,都迫切渴求一本相对稳定而成型的读本。为此,我萌生了将学术性较强的《政治传播活动论》改写为简明读本同时出版的想法。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是致力于专业化出版的,打造传媒类精品图书的实力强大的出版社,我欠了他们两部书稿的“债”,所以,非常乐意将这部书稿交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来出版,我个人觉得,我们这样做,无论从哪个角度、哪种意义上都是必要的,也是十分妥帖的。

荆学民

2014年5月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 1

第一章 政治传播活动的基本结构 / 1

- 第一节 从三个维度认识政治 / 2
- 第二节 从社会的深度理解传播 / 14
- 第三节 从政治与传播视界融合理解政治传播 / 16
- 第四节 区别几种涉及政治传播的学科 / 24
- 第五节 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活动来研究 / 29

第二章 政治传播主体 / 33

- 第一节 人是政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 / 33
- 第二节 政治传播主体形态 / 36
- 第三节 政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意识 / 40
- 第四节 国家与政府作为政治传播主体 / 43
- 第五节 政党作为政治传播主体 / 52
- 第六节 社会共同体作为政治传播主体 / 61
- 第七节 个人作为政治传播主体 / 70

第三章 政治传播内容 / 89

- 第一节 解读政治信息 / 89
- 第二节 作为一种政治信息的意识形态 / 91

第三节 作为政治信息的政治价值 / 101

第四节 作为政治信息的政治文明 / 109

第四章 政治传播中介 / 115

第一节 中介、媒介、媒体 / 115

第二节 作为基础性中介的政治组织 / 121

第三节 作为核心性中介的大众媒介 / 131

第四节 作为外表性中介的政治话语 / 142

第五章 政治传播客体 / 154

第一节 客体、对象、受众 / 154

第二节 政治传播客体的内与外 / 161

第三节 作为客体的精英与群氓 / 169

第四节 作为客体的臣民、市民与公民 / 181

第六章 政治传播效应 / 192

第一节 对传播学效果论研究的检讨 / 192

第二节 政治传播效应(一):推进政治民主 / 199

第三节 政治传播效应(二):形成公共舆论 / 207

第四节 政治传播效应(三):构建政治合法性 / 222

第七章 政治传播形态 / 233

第一节 政治宣传 / 233

第二节 政治沟通 / 253

第三节 政治营销 / 260

第四节 三大形态的逻辑关系和理论比较 / 272

第五节 三大形态的实践过程 / 276

参考文献 / 285

第一章

政治传播活动的基本结构

英国学者麦克奈尔在《政治传播学引论》的扉页赫然引用了早年李普曼的话：“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在新一代掌权者的政治生活中，劝服已然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与大众政府的常规器官。还没有人开始整理这场革命的结果，然而说如何制造同意的认识将改变所有的政治前提将毫不为过。”^①当麦克奈尔极度赞赏李普曼这种深刻的理论洞见的时候，花了极大的心血用自己的《政治传播学引论》总结了这场“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现在看来，把“制造同意”与政治传播本质性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视政治传播的本质为“制造同意”，是麦克奈尔在李普曼之后对政治传播研究的独特贡献。

而我之所以在这里再一次重复引用且强调“制造同意”与政治传播之关联，是因为在我看来，远在麦克奈尔之前，至少西方社会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已经如火如荼，在麦克奈尔之后，也可谓枝繁叶茂。然而，在这种如火如荼和枝繁叶茂的研究景观中，被李普曼和麦克奈尔已然揭示的政治传播的“制造同意”的本质却似乎在渐渐隐退。人们也许碍于人类政治文明的相通性、相容性，有点羞于在生硬的“制造”意义上揭示和认同如火如荼的政治传播的现实，给“制造同意”的革命意义包裹上了一层温柔而漂亮的政治艺术的面纱。

至于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尽管从政治传播的实践或现实看，快速发展和急剧变迁的社会，对政治传播理论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急迫和强烈，但是，政治传播的研究看起来纷纷扰扰的背后却始终步履蹒跚，主要的表现是关于政治

^① 转引〔英〕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琪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扉页。

传播的基本理念还没有形成。

理论研究是不能“大跃进”的。冷静看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步履蹒跚倒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静下心来,从理念底层耐心梳理一下适应于我们中国人思想方式的政治传播,诸如观念、范畴、范式、框架、逻辑、机理、机制、形态等基本原理甚有好处。鉴于此,笔者思考很久,决定从政治传播的“底层”开始思考和写这本书,也许从状貌上看,是一些散乱型的遑论,但希望不只是陈旧老话。

第一节 从三个维度认识政治

政治貌似熟知,其实无法定义,因为政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固定在哪种含义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曾说:

确切地说,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复杂的事物,很可能还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备处理政治复杂性的技能,人们就会草率或过分地简化政治,这就是危险。公正地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确实都把政治简单化了。^①

所以,认知人类的政治,需要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展开。从理论上讲,历史先于逻辑,所以我们就先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一下人类的政治。

历史以“历时态”呈现。从人类政治历史演变的“历时态”看,政治与国家、经济、社会关联。所以,要想简单而清晰地认知政治,还需要从国家、经济、社会等几个关联维度结合人类的政治思想史来加以梳理。

一、从国家维度认识政治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政治现象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因而,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所体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中各阶级围绕着“国家”的统治权力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因此,从与国家关联的角度来认识、把握、研究政治,是贯穿人类几千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线,直至当代仍然如此。

西方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是古希腊(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古希腊的

^① [美]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版),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奴隶制由二百多个奴隶主统治的相互独立的城邦组成。“公民”不能离开自己的城邦而生活,否则就可能沦为别的城邦的奴隶。城邦是如何来的?怎样才能有一个好的正义的城邦,怎样才能过好城邦生活?这些就是那个时候人们所关心的根本政治问题。考察城邦、研究城邦就是古希腊政治思想也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在西方,“政治”(politics)一词就是从“城邦”(polis)演变而来的。

古希腊奴隶制形成时期的著名思想家赫拉克利特主张通过斗争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并且只有依靠法律,人们才能过好城邦生活。毕达哥拉斯则主张各等级的和谐就是一个正义的城邦。著名政治家梭伦认为应在富者和贫者之间实行某种协调、平衡,建立好的城邦。著名的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把自由、法制、平等作为城邦生活的基本原则,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理想的基础。

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民主制城邦失败、斯巴达奴隶主贵族胜利而告终。这极大地促使政治思想家们研究什么样的城邦最好、怎样巩固城邦等问题。柏拉图继承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理论。柏拉图认为,国家无非是人性的扩大。人的本性即灵魂由理性、意志和欲望三部分构成,国家由统治者、守卫者即军人和劳动者三个等级构成。统治者由具有哲学知识即智慧美德的哲学家来担任,军人应以勇敢为美德帮助统治者,劳动者应以节制为美德来服从以上两个等级的统治。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和谐一致,就具有了正义的美德。这是一个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德性的“理想国”。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这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个人与国家(社会)本质地结合为一。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是一个发展显现的过程,国家也有一个起源的过程,人类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必然要组成家庭;随着人口的繁衍、家庭的增多,就出现了若干个家庭联合而成的村坊,若干村坊又组成城邦,亦即国家。国家出现,使人的本性得到了实现。

到了古罗马时期,政治思想家西塞罗把人类对政治的认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他一方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思想,相信“人不是孤立的或非社会的存在”,人必然结成国家;另一方面认为罗马国家是长期历史演变而产生的。西塞罗认为国家应该通过法来统治,法是国家的基础,这样就把古希腊以道德作为国家基础的观点改变为以法作为国家的基础。

西方中世纪封建社会,基督教是人们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唯一基础。拥护教权至上的神学家们鼓吹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和安排的;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世俗的国家权力是上帝通过教会而给的,因此教权高于王权。世俗国王的思想代表则提出君权神授,君权直接来源于上帝,王权不受教权支配。从本质上讲,这两种思想都是从上帝出发来说明政治权力的,人的理性必须服从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权政治理论是为中世纪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服务的。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各国资产阶级虽然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革命性的强烈程度不尽一致,但都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政治思想。从人的理性出发研究各种政治问题,批判神权政治观,要求人的种种权利以及保障这些权利的政治制度,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特征。值得我们分析的有几个代表人物。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奠基人之一,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率先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世纪神学政治观的基础,开始从人而不是从神来研究国家。在国家政体问题上,马基雅维利赋予共和政体以集“暴力与欺骗”、“狮子与狐狸”的特性于一身的威权,至今仍有别样的历史意义。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提出了关于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论。洛克则进一步深化了霍布斯的政治理论。认为如果立法权或君主危害了人民的自由和财产,那么人民就有权起来革命,把国家权力收回,交给自己认为最能保证他们安全的人。

法国启蒙运动中最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卢梭认为,由于私有制的出现使人类出现了不平等。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人们订立社会契约,建立了国家。人们订立社会契约,是把个人的权力交给一个公共人格或叫“公意”。这个公意是人民的意志,它构成主权——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是最高的权力,它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能代表。法律要由人民直接参加立法来定;政府官员不过是人民的公仆,人民可以随时撤换。因为全体公民都要参加立法,所以,只有小国寡民才能办到。这就是卢梭所设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德国的康德继承并改造了卢梭的政治理论,他从哲学俯瞰政治,把卢梭的“公意”改造成一种绝对命令,表达了人是目的的高贵哲学思想。

从国家的维度对人类政治考量,从哲学论证和理论形态的成熟与影响程度上看,无疑当属德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黑格尔。黑格尔认为,所谓国家,指的是“伦理理念的现实”^①，“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的理念’”，是神自身在地球上的行进,因此,它也就是一种“‘自由’的实现”。在他看来,“现实的国家在它的一切特殊事务中……都被……‘民族精神’所鼓舞”。^②正因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化,是自由的化身,是高于市民社会的政治实体,所以它才能担当起协调社会生活、促进个人道德水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才能在保护市民社会的同时成功地实现对它的超越。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伦理观念变为现实的产物,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个人与国家的统一,个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有自己的人格、自由和权利,所以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国家的目的在于普遍的利益,但并不排斥个人的利益,国家正是把个人作为一个环节包容于自身之中,国家与个人也达到了统一。

黑格尔走向并树立了政治观上的国家主义。这种政治观深深影响着其后的政治思想家们,成为至今人们观察和认识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主流思想和理论,以至于现时代的政治理念仍然难以摆脱其影响。

二、从与经济对应的维度认识政治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还没有什么独立性,在很大的意义上政治生活就是他们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的社会生活。当人们维持生活与生产资料的经济生活逐步凸现出来,进而越来越具有独立意义的时候,人们便从与“经济”相对应的意义上认识、把握和对待政治了。

应该说,在当下社会里,人们对于政治的认识更多地是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或者说是从与经济关联的维度来把握和认识政治的。从经济维度把握政治并进一步深刻认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仍然是马克思。我们可以认为,在从经济的维度研究政治进而研究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人类至今思想认识的最高成果。

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以前一切社会所取得的巨大的物质成就,以及围绕经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3页。

②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90页。

济利益而展开的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使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①。

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政治是相对于其他社会力量的发展而逐步获得自己的本质规定性,尤其是经济力量的快速发展。通过对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不仅解决了政治的基础、本质、轴心、基本内容等重大问题,而且从根本上克服了自马基雅维利以来政治内涵愈趋狭隘的片面性。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其核心是国家政权;另一方面,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又涵盖且高于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事物,是统帅,是灵魂。马克思自己着意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无所不包的、以伦理或神学统辖一切的广义政治,而是具体的、真实的、对人类有极为重大意义的“经济方面的政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对政治本质的揭示,为我们理解相对于经济的政治的内涵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当我们从与经济对应的维度思考政治的本质的时候,政治就成为一种能够作用于经济活动的国家权力,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权力的运行机制,它决定着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等基本问题。当然,从与经济关联角度来认识政治,“并不等于说经济与政治是同一回事。经济分析主要关心稀缺资源以及物品与劳务的生产和分配;而政治分析,正如我们反复说过的那样,聚焦于影响力的应用以及运用影响力的模式。人类或人类群体的活动,可以同时具有政治的与经济的方面。……可见,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所分别探索的,只不过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而已”^②。至此,政治的特殊内涵逐渐被限定,政治也据此获得自己的规定性。

三、从社会结构维度认识政治

从社会维度对政治的认知和把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诸多领域混沌不分的早期,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1页。

② [美]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版),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社会”生活,这种政治、社会生活可能仅仅只是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而言的。如果说,这可以视为从社会关联或意义上的“政治”,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分界是完全不自觉的。随着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突出及其对政治的制约,人们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认知和把握政治,而当人们能够自觉地从高于经济和政治本身的境界来把握政治的时候,实际上又是从“社会”的境界和意义上对政治的把握。这正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正是在这个升华的过程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关于人类未来社会的“政治信仰”。

从理论上讲,人类社会发展至近代,随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相对分离,人们才真正对“社会”开始理论自觉。一开始,近代思想家如培根、霍布斯、卢梭、洛克以及更多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在反叛宗教神学的启蒙旗帜下,致力于确立人对自然界的“主体性”,确立主体自我意识。但是,这个时候的人类“社会”,并没有获得与作为主体的人以及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等量齐观的理解。在他们的思想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自在的整体,依然只是自然界的延伸,是各种“自然状态”的表现。同时,在他们把人的活动还原为动物式的生存竞争行为时,又总是把社会看成是实现个人私欲的名利场。

德国古典哲学经康德、费希特至黑格尔,社会与自然状态的国家,都是“在统一体被确定为一个整体时被给出的无形式的和外在性的和谐的空名”^①。黑格尔有时候称社会为“第二自然”,实际上还是在自然的意义上理解社会,虽然如伽达默尔所说,“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念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②,但他并没有完全真正理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黑格尔在其著作如《历史哲学》中探讨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进步、历史必然性等问题,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了“理性社会”概念,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把社会消解于历史之中,又把历史本身消解于他的绝对精神之中。历史成为体现和承担“理性的狡计”的舞台。费尔巴哈在他的《未来哲学原理》和《信仰的本质》中也提出了“社会”概念,但却是在“类”的意义上展开的,并且是在对宗教展开人本主义批判活动中形成的成果,它构成了费尔巴哈所谓未来哲学及其信仰的基础。

① Hegel, *On the Scientific Ways of Treating Natural Law*, 《黑格尔政治著作选》, 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13 页。

②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振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1 页。

马克思承认费尔巴哈的社会观“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诚恳地认定：“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①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并“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②

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社会观的地方在于，马克思把社会与政治联系起来，或者说，通过政治批判构建了“新社会”，从而使我们获得以社会维度认知政治的新视角、新境界。

在马克思看来，新的社会是一个生成和实践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新的政治的诞生过程。对马克思而言，人类新社会的生成已不是“哲学”的任务，既不是黑格尔式的哲学抽象，也不是费尔巴哈式的哲学直观，而是“实践批判”。这种实践批判包括经济和政治批判。不可忽略的恰恰是马克思的政治批判。马克思的政治批判，蕴含了与马克思新的社会观相匹配的新的政治观。

马克思的新的社会观与政治观的内在一致，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解放关涉着社会解放。换句话说，对马克思而言，社会解放本身就包含着政治解放的内容。马克思并不希望空泛地讨论人类解放问题，而是要求把这一讨论与对一定社会制度的政治性质的批判联系起来。社会解放的实质其实是社会关系的解放，是社会的政治解放。市民社会的解放，其实质并不是市民社会本身的实现程度，而是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解放出来。政治解放并不只是颠覆旧世界，它必然要求进一步体现为新社会的建设，这个新社会显然不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前进的历程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轰轰烈烈的历史存在，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看，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财富。即便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沉寂”时代，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实践经验的财富性质并没有改变和消失。

在前述我们关于政治的梳理中，研究思路不是从既定的“政治”概念出发，而是从社会的政治现象和事实出发，从人们关于政治的既有认识出发，以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我们完成这种梳理之后，浓缩至当代，有两个人分别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所做出的研究，可供我们特别借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1995年,英国政治学学者肯尼思·米诺格出版了他的《政治的历史与边界》经典小册子,就是试图通过从历史角度给政治划界而确定政治最后是什么。他从真实的历史事实出发,一开始就把“专制”排除在政治之外。他以宗教信仰为历史轴线,通过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人类政治事实的变革,最终对“现代政治”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宗教信仰的变化,现代国家已经把关于政治的整个观念颠倒了过来。古典时期的人们从为国家服务中得到人性的最大满足;现代欧洲人作为个体最关心的是灵魂得救,他们往往认为国家的作用只是保障和平,使国民能够推行自己的计划。自由派的国家观念只是以上态度的世俗翻版。人们也许认为这样的国家是软弱和涣散的,但实际上现代国家相当强硬、持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权力哲学》(1821年)中称国家是“上帝在地球上进军”。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却预言式地表述出继他之后许多欧洲人的看法:国家与宇宙命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过去两个世纪中发生的大规模战争证实了这个看法。接着,从日渐衰落的中世纪王国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异的新式制度机器,“国家”——这种新奇的政治形态立即席卷世界。它是人类的能力所创造出来的最接近无限威力的产物。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国家立即成为人们寄托各种美梦的支点。在正确理解之下,人类的哪种缺陷不能通过它来弥补呢?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揭示出现代政治发展的节律。第一种是对国家的自由派观点,来自中世纪自由和王权的观念,主张建立公民秩序保障良善生活。第二种观点认为国家是一种压迫工具,高高在上地从精神上压迫着受它奴役的民众,所以,国家是一种压迫人的东西,需要用人性来改造。这两种观点激发了这样一种设想:超越国家,创造一个完美的共同体,使政治中不可避免的那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能够最终被填平。现代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两种观点所代表的倾向之间的沟通平衡。^①

肯尼思·米诺格之后,同是英国学者的安德鲁·海伍德从国家、经济、社会

^① [英]肯尼思·米诺格:《政治的历史与边界》,龚人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4页。

的“综合维度”来认识政治,并把这种认识写进了他的经典教科书《政治学》中,他把现时代人们对政治的看法归结为如下四种:

第一种,明确地将政治与国家活动和政府艺术联系在一起。海伍德评析说:这可能是比较经典的政治定义,由“政治”第一次在古希腊时期的最初含义发展而来。从这种观点来看,政治本质上是国家范围内的活动,这意味着大多数人民、机构等社会活动都可以被认为是“外在于”政治的。

第二种,明确地将政治视为“公共”活动,因为与这种活动相联系的是对共同体事务的引导和管理,而不是个人的“私”事。这种观点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一种观念:人类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过上“善的生活”。

第三种,明确地把政治视为是一种解决冲突的特殊方法,即通过妥协、安抚和谈判而非强制和赤裸裸的权力来解决冲突。在这种观点看来,政治的关键是权力的广泛分布。鉴于冲突难以避免,这种观点主张相互妥协而不是相互倾轧。海伍德认为,把政治的本质视为“妥协”是把政治作为一种文明和教化的力量。

第四种,将政治与社会存在进程中的资源生产、分配和使用相联系。由此看来,政治是关于权力的,而权力则是不择手段达到预期结果的能力。海伍德认为,这种观点最宽泛也最为激进,它已经企图将政治从特定的场域(国家、政府、公共领域)拓展出来,认为在所有社会活动和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政治在发挥作用。政治发生在社会互动的所有层次,小至家庭,大到民族及全球交往都存在大量的政治现象。这样一来,政治广义而言是权力,狭义而言是围绕稀缺资源的争斗,权力是争斗的手段。海伍德把马克思的政治观列入这个行列。^①

四、用何种范式来分析政治

当我们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政治进行历时态与共时态的解读之后,需要总结一下对政治分析的基本范式。这种范式可以归纳为三种。其一,以个人为政治分析单位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分析。这种分析范式的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因而崇尚的是“天赋人权”、“公”“私”分明、政府合法性来源于民、政府(政治)为“恶”、制约权力等政治制度设计理念。

^① 以上观点和分析,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第二版),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4页。